

評介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416 pp.

何 淑 宜

臺、前言

作者 Andre Gunder Frank 於 1929 年出生於德國柏林，後來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拉丁美洲等地各大學，由於在思想上傾向左翼的政治立場，因此特別關注殖民地與前殖民地的低度發展狀況(underdevelopment)，他提出「都會」(metropolises)和「衛星」(satellites)的概念，來研究已開發國家和低度發展國家之間的關係，¹後來接受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看法，將此融入自己的都會—衛星理論中，並用以從事有關拉丁美洲的研究，自 1967 年開始先後完成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¹ Frank 認為在國際層次上已開發國家為都會，低度開發國家為衛星，而以開發國家的經濟重鎮是中心都會，低度發展國家的出口和金融中心則是衛星。這種關係也存在低度發展國家內部，因而形成有層級性的聯繫網。透過這個聯繫網，已開發國家得以將剝削的觸角延伸至低度發展國家的各個角落。參見龐建國，《國家發展理論》（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3），頁 145。

Dependent Accumul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 等書，屬於依賴理論中主張低度發展論的代表性學者。²

本書是作者長期思考第三世界經濟、社會發展，以及 80 年代之後對世界體系重新檢討後的力作，其中美籍阿拉伯裔學者 Janet Abu-Lughod 所出版的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一書，無疑對作者有極大的影響。作者在評論該書時提出，「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也許並非無中生有，而是 Janet Abu-Lughod 所說的同一個世界體系的延伸。此後他不斷尋找在現在世界體系之前是否存在可以稱為體系的東西，並發表一系列著作，證實他的想法，亦即世界體系至少可追溯到五千年以前，在全球的世界體系裡，部份的變化和整個體系及體系內的其他部份密切相關，因此，不應如先前韋伯、布勞代爾等學者般把歐洲視為一個獨立的實體，再由其內部找尋變化的根源。³ 本書即在這樣的關懷下，由反省 19 世紀以來逐漸流行的歐洲中心論出發，將視線拉大到世界，試圖以全球的視野重建 1400-1800 年之間的世界經濟圖像。

貳、內容摘要

本書除前言外，共分七章，以全球世界經濟的視野，概觀西元 1400-1800 年之間世界經濟發展的樣貌，並以白銀為穿針引線的媒介，論述此一時期世界經濟體系得以建立的關鍵，以及體系內各個部份的變化與互動的情形，最後檢討 1750 年之後體系內各部份（主要指亞洲與西方）重要性與地位的轉換關鍵。書中章節如下：

² 低度發展論為依賴理論的一個流派，主張依賴有害無益，在依賴的情境下，開發中國家必然落入低度發展的困境，因此若要超越低度發展，躋身發展國家之列，唯一的可行之道是建立自主性的社會主義經濟。參見蕭新煌，〈低度發展與發展—發展社會學選讀〉（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87），高棣民序，頁 10；龐建國，〈國家發展理論〉（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3），頁 142-143。

³ 陳燕谷，〈重構全球主義的世界圖景〉，收入 Andre Gunder Frank 著，劉北城譯，〈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3），頁 5-6。

第一章：導論

第二章：全球貿易的旋轉木馬（1400-1800）

第三章：貨幣周遊世界，推動世界旋轉

第四章：全球經濟：比較與聯繫

第五章：橫向整合的宏觀歷史

第六章：西方為何能（暫時性）勝利？

第七章：歷史研究的結論與理論上的意義

綜觀全書，作者在顛覆長期以來流行於社會科學界與歷史學界的歐洲中心論的主旨下，檢視全球經濟的聯繫關係，重新重視亞洲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重要性。因此全書的關懷重心大略可分為下列幾點：一、1400-1800 年全球貿易的世界勞動分工與平衡；二、白銀在此時期所發揮的功能；三、此一時期亞洲所具有的生產力、技術、經濟制度的優勢，及與此時歐洲的比較；四、西方為何能在 18 世紀晚期逐漸興起。除此之外，由於作者寫作本書有扭轉歐洲中心觀偏見的使命存在，因此在導言與第七章中作者用了極多篇幅檢討 19 世紀以來社會科學與歷史學中理論的偏誤，並呼籲需建立一個新的，以全球為出發點的研究典範。

一、1400-1800 年全球貿易的世界勞動分工與平衡

針對許多學者認為世界經濟只是在現在才開始「全球化」的觀點，作者提出反駁，認為延續 Janet Abu-Lughod 所提出，在 13、14 世紀已存在的非洲—歐亞世界體系，近代早期也存在一個世界市場與世界分工貿易體系，而這個世界市場的中心顯然是在亞洲，尤其是中國。而亞洲的支配形式更從 1500 年一直持續到 1800 年前後，其中歐洲正是因為亞洲的吸引力而開始海外航行，並因大量挖掘美洲的金銀（尤其是白銀），而逐漸參與當時的世界經濟體系。因此，應該把焦點轉回到久受忽視的亞洲。由於在這個世界經濟體系中，整體的各個部份相互影響，而美洲白銀又具有穿針引線的作用（負擔平衡世界貿易的功能），因此作者在敘述脈絡的安排中，

以美洲爲起點，繞著地球向東走，逐個地區（美洲→非洲→歐洲→西亞→印度→東南亞→日本→中國→中亞→俄國、波羅的海區）討論全球多邊世界貿易關係，並以中國爲世界貿易的中心。

首先，大西洋三角貿易是美、非兩洲加入世界經濟分工的重要關鍵。在美洲，主要是因爲白銀，使其成爲歐洲人通往亞洲的中轉站；在非洲，三角貿易則補充著原有的跨撒哈拉內陸貿易。而歐洲此時恰扮演了以美洲金銀交換亞洲商品的中間人角色。在此時的世界分工中，西亞的鄂圖曼帝國與波斯的薩菲王朝也具有重要性。鄂圖曼帝國西與歐洲進行貨幣貿易，東由中國買進商品，並藉由軍事擴張保持優勢。波斯則透過陸上與海上貿易的互補，維持與歐洲及亞洲之間的貿易平衡。

印度則透過輸出棉織品與銅，獲得西亞的金銀；並以棉織品換取東南亞的香料，以白銀換取中國的絲與瓷器，同時藉由內部本身以及與亞洲各地的陸路貿易，與海上商路互補。半島、島嶼林立的東南亞也因地理位置成爲世界貿易的天然交會點。此地的特色即在於一些擔任轉口功能的港口，如麻六甲、馬尼拉等。同時，它不僅向歐洲、西亞、印度等地輸出香料與錫，更將獲取的白銀轉口輸出到中國。而日本則因屬於東亞朝貢體系的一員，深深涉入世界體系之中。

此時，中國也因早熟稻與救荒作物的引進，與來自四面八方的白銀，在人口與生產上均空前成長，尤其東南沿海更甚。絲、瓷器、茶葉做爲中國的主要商品，大量到亞洲各地，並透過東來的歐洲商人輸到歐、美，使中國貿易保持著大量順差。這時候跨中亞商隊貿易看似衰落，其實是由地區性南北貿易取代。到 17 世紀末 18 世紀初，穿越俄國的跨大陸貿易也在彼得大帝的努力下興起。

由上述的討論，作者指出，1400-1800 確實存在一個由商人和貿易活動主導，包容全球的貿易體系與勞動分工，中國以大量的貿易順差成爲核心。並以「同心圓」來形容當時的世界經濟景況，即中國→東亞→亞洲地區圈、亞非地區圈→歐洲、大西洋、美洲。而在這一體系中有兩個特點需要注意：（一）16、17 世紀這些地區與世界其他部份的貿易關係強過與各自地區內窮鄉僻壤的關係；（二）有一群離鄉背井的商人和商業移民群體

在這些地區間貿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作者認為若以「中心—邊陲」來形容此一世界體系，中國、東亞、亞洲是經濟中心，而此時的歐洲則處於邊緣的地位。

二、白銀在此時期所發揮的功能

作者認為此時期全球經濟「發展」的動力，是由於這個統一的世界經濟有一個不均衡的運動，而白銀做為貨幣和商品無疑是具有中介地位的要角。白銀當作商品的利潤極高，歐洲人即透過西亞或太平洋等路線，大量將美洲白銀運往亞洲，尤其是中國，因為在中國的金銀比價較低，白銀因而被大量輸到亞洲（尤其是印度）以換取黃金，形成一種貨幣的套利兌換，其中的利潤就被用來支持他們在亞洲各地的貿易，並使世界逐漸確立銀本位制度。

既然如此，到底有多少白銀被運到中國？作者根據許多經濟史家的估計，認為包括來自美洲與日本白銀，此時中國至少佔有世界白銀產量的二分之一。如此龐大數量的白銀進入中國後如何被使用？作者反對華勒斯坦等學者所提出的囤積說與奢侈說，認為大量金銀（主要是白銀）造成新的流動型態與信貸型態，進而促成了世界範圍的生產急遽增長，然後又反過來滿足新的貨幣需求，形成一種循環的過程。尤其是對中國、印度、東南亞和西亞的工業發展影響最大。

作者主要透過考察印度、中國等地的物價之後，指出亞洲並未因大量白銀而有通貨膨脹的現象，相反地是造成生產與交易的增長，再通過更廣泛的商品化，提高貨幣流通速度。如在孟加拉，邊區地區隨著土地需求（種植棉花與糧食）而大量開發；中國南方，農民也歷經了經濟上的理性選擇，在外界需求的刺激下，透過開發邊區、改種經濟作物等各種方式增加生產。因此，貨幣供給在亞洲刺激了生產，也支持這些地區的人口增長。而這樣的經濟擴張一直持續到 18 世紀。

三、此一時期亞洲所具有的生產力、技術、經濟制度的優

勢，及與此時歐洲的比較

作者認為亞洲在經濟體系中的重要性不僅是由於人口與產量的龐大數量，主要還是因生產力、競爭力、貿易的優勢（作者稱其為資本構成的優勢），而這與其技術和經濟制度有密切關係。作者先由人口與收入兩方面來證明亞洲生產力的優勢。以人口增長而言，1400-1750 年亞洲（尤其是中國、印度）增長的速度超越歐洲，佔世界總人口 66%，而它的生產總值在 1750 年則佔世界的 80%；另外，人均收入與生活水準上，亞洲均高於同時的歐洲，作者由此推知亞洲具有較大的生產力與競爭力。

如此龐大的生產力，作者認為與技術和經濟制度有關。他指出 1500 年之前技術主要在亞洲之間流傳，之後才傳播到歐洲，且為了增加產量，亞洲人也鼓勵發展技術，如造船業、印刷術等，而多數學者所重視的科學革命，並未對技術有太大影響。所以，作者認為並沒有獨特的歐洲技術，因為技術發展是發生在世界經濟的結構裡。

對於制度因素，作者也持相同觀點，他反對完全以制度因素來解釋經濟變動，也就是與其說制度是造成經濟變動的決定因素，不如說是經濟變動的衍生物，且需適應經濟的擴張而調整。他大力抨擊所謂歐洲的金融、商業制度優於其他地方，再擴散到各地的觀點，主張以全球相互依存的聯繫關係，來觀察制度的發展。在 1400-1800 年的情況是，亞洲的商業、金融制度已經非常複雜，所以，歐洲人在進入亞洲世界時也需採用亞洲的運作方式。

四、西方為何能在 18 世紀晚期逐漸興起

對於歷來學者認知的西方特殊性與亞洲始終是「傳統社會」的看法，作者以經濟週期的觀點來加以駁斥，他認為在這個世界體系中有一個同時性的經濟週期，且自公元前 1700 年即已存在，而非洲—歐亞地區均會經歷這種擴張「A」階段與收縮「B」階段的演變，每一週期大約 2 到 3 世紀。在這個大的經濟週期中，另外有一些小的 Kondratieff 週期（每個循

環大約 50 年)。

依此，作者認為 1400 年全球開始長期擴張週期（A 階段），並持續到 18 世紀前半期，此時生產與經濟的中心均在亞洲，透過美洲白銀，歐洲也逐漸受到刺激；1750 年可視為一個轉折點，開始進入衰落階段（B 階段），在這個過程中，邊緣地區才有機會改善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但是前提是體系中心先發生危機，證之歷史亦然，也就是亞洲先步入衰落，歐洲才得以趁機趕上。當然在近代早期的這個循環週期，也有數次小的 Kondratieff 週期的 B 階段危機。其中包括 1640 年的銀貨危機（作者不同意將之稱為全球的「十七世紀危機」），與 1762-1790 年的衰退。

為何 1750 年後世界經濟開始衰落？作者主張轉變的關鍵在於亞洲先前擴張的有利因素開始轉為衰落的主因，亦即社會上收入分配的不均與社會地位的兩極化，終於導致對有效需求的制約及政治的緊張局勢。作者以人口因素加以解釋，他贊同 Mark Elvin 的說法，進一步指出因人口的大量增加，在經濟理性的選擇之下，反而減少了對機械的需求，代之以用廉價的勞動力，如此阻礙了技術的進步。而歐洲先是透過白銀與三角貿易，獲取利潤並進入世界市場，進而趁著亞洲本身的逐漸衰弱，及早先為了與亞洲競爭而發展出的工業革命，終於有了凌駕亞洲之上的力量。

此現象的最直接證據是 1750 年人口增加速度難以解釋的變化。1700-1750 年亞洲的人口由高增長率轉為低增長率，相反地，歐洲的增長卻加速。作者指出這是因為工業革命使勞動擴展，且歐洲、亞洲在農業與工業之間的勞動配置也產生差異等因素所造成。所以，東西方地位的轉變是一種世界經濟體系當中，週期循環的現象，並非歐洲的特殊性與現代性所造成。作者並預言，由歷史長期趨勢看來，歐洲的成功是相較於原來在全球經濟中的邊緣地位，所以是一種暫時性現象，最後會被證明是相當短命的。

參、討論與評論

延續著早期反資本主義宰制的觀點，作者在本書中也充滿了反抗的精神，只是他這次反抗的是結構更龐大，且沿襲已久的學術傳統——歐洲中心觀。自薩依德以降，許多學者已開始檢討歐洲中心主義所造成的研究偏頗，⁴與他們不同的是，Frank 不僅將研究由文化、知識傳統的領域延伸到經濟問題，更試圖提出一種全球的觀點來加以考察。因此他的論敵包括馬克斯、韋伯、湯恩比、布勞岱爾、華勒斯坦、亨廷頓、福山，甚至早年主張依附理論的他自己本身等，尤其集中在批評布勞岱爾與華勒斯坦。書中對於他們所提出的「傳統停滯的東方社會」、「資本主義在歐洲興起的特殊性」、「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等看法，一一駁斥。

由於本書處理的結構龐大，因此在資料運用上，作者大量使用近人研究成果，並以絕佳的統合能力，利用這些成果來反覆論證自身的觀點，尤其大量運用許多非西方學者考察各地發展的研究，這是本書的最大特色之一。另外，因為全書主旨以反歐洲中心觀出發，因此在寫作方式上，也刻意注重對歐洲以外，其他地方經濟情況的描寫，尤其是亞洲的印度、中國、東南亞等地。作者認為他所討論的這段期間內（1400-1800 年），白銀是將世界各地串連起來，組成一個體系的關鍵，因此，在內容上，對世界各地的白銀貿易也討論比較詳細，不過，他主要討論的部份為美洲經歐洲，再由西亞（鄂圖曼帝國、波斯）、印度，最後到中國的這條路線，對於大帆船經太平洋，到馬尼拉，再到中國的部分，則討論較少。

然而，誠如王國斌在本書序言一開頭中所說的：「這是一部極具挑戰性的重要著作。」⁵本書的核心概念，以全球世界經濟的宏觀架構，將討論的焦點重新擺回亞洲，來挑戰歐洲中心論的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理論，這

⁴ 美國的中國史學界有關「中國中心觀」的興起，注重所謂「傳統內變遷」，也屬於這股潮流。見柯保安（Paul Cohen）著，李榮泰譯，《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社，1991。

⁵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 1.

樣的用心，不可謂不善，但卻也不容易達成。因此，本書一出版，隨即引起歐美學界的討論，華勒斯坦主編的期刊 *Review*，不久也邀集曾與 Frank 共同編纂過數部書籍的 Samir Amin、Giovanni Arrighi、Immanuel Wallerstein 等資本主義研究的重要學者，撰寫專文，討論該書。⁶而在中國大陸，也由劉北成教授於去年將此書翻譯為中文，譯本一出，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歷史所便邀集李伯重、葉坦、劉北成等教授，針對此書展開討論。

在諸多學者的書評與討論中，作者破除歐洲中心論的動機，並將研究視角拉大，不單獨看各地的歷史，而以全球、整體的觀點來考察，是為大家所肯定的。但也因為作者設定的論述的範圍廣泛，結論也大膽而堅決，因此不免引起許多非議。其中，中國學者由討論他提出的結構出發，並以親身的中國研究為檢證，對 Frank 的諸多觀點提出質疑。他們質疑的焦點包括貿易量的大小所代表的意義、當時的東方農業國家是否如作者所說的如此依賴「全球化經濟」、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係等。而西方學者除懷疑作者對資料的使用方式與解釋角度外，主要針對何謂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來展開討論。

由於涵蓋的層面甚廣，論述的地域範圍更包含全球，因此筆者實無能力加以評論，只能整理諸位學者對本書的論評，並就筆者所見，發表一些讀後感想。

就資料運用而言，作者使用大量二手研究成果，其中大多為 80 年代之後成書者，但有關中國的部份主要引用何柄棣、全漢昇等學者早期的論著，及濱下武志的觀點，若能加強 80、90 年代之後許多學者關於中國與東南亞貿易關係的成果，將更充實。另外，白銀的世界流動是全書的主體架構，且認為金銀的套利兌換是歐洲人努力將白銀送到中國的關鍵，但是當作者討論白銀的由西向東流動時，卻未提供具體的數據證明黃金由東向

⁶ 三位學者的文章分別為：Samir Amin, "History Conceived as an Eternal,"、Giovanni Arrighi, "The World According to Andre Gunder Frank,"、Immanuel Wallerstein, "Frank Proves The European Miracle." 三文俱見 *Review*, Vol.12:3, 1999.

西流動的情況，是否此時印度或中國有相當數量的黃金被運送到西方？似乎有再深入探究的必要。此外，在討論亞洲於 1750 年後走入衰弱階段時，作者接受 Jack Goldstone 的觀點，並引伸認為「亞洲的證據顯示，生產和人口的增長造成資源壓力，使經濟和社會都兩極化，收入分配越來越不平等。」⁷但他只引述印度的情況，並未深入討論中國或其他各地，中國在 18 世紀中期之後是否存在此種現象？又，之後的變亂叢生，是否能單純用收入分配不平均來解釋？值得再加討論。

再則有關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作者傾向否定制度對經濟發展的驅動或限制能力，因此在引述證據，證明他所認為 1400-1800 年間關於亞洲的商業制度與金融制度優於其他地區時，立論顯得極為薄弱而片面。例如他認為東方國家其實在交通、軍事方面有促進經濟發展之功，但這樣的說法似乎有些倒果為因。以中國為例，且不論國家是否有所謂的抑商政策，但至少此時的政府也甚少制訂有利經濟發展的制度。且制度的內涵除具體的法令規條、政策措施之外，還包括社會習俗、價值觀念等，中國經濟受傳統政治與習俗觀念約束的部分恐怕大於作者所認為的農民的經濟理性的選擇，這由到 20 世紀，中國許多地方仍維持自給自足的生活型態，可作證明。所以貿易量的龐大，並不一定如作者所言，表示商品經濟的發達。⁸也就是說，在處理制度問題時，作者似乎有意無意迴避會產生反證的資料。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他對西方為何興起的討論。他將西方興起的原因歸因於亞洲的衰落，與西方利用白銀趁機進入已存在的世界體系。但西方在此時逐漸取得優勢憑藉，當不止於此，大陸學者王家範即認為，西歐的變化必須與該時期國家財政變革、工商業發展型態聯繫起來共同考察，如英、法等國 14-15 世紀財政制度上發生了由特權制財政轉向協定制財政的發展，⁹這種制度上的變革，無疑對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但在本書中，

⁷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p. 305.

⁸ 葉坦，〈關於《白銀資本》〉，《光明日報》，2000.5.23。

⁹ 王家範，〈解讀歷史的沈重-評弗蘭克《白銀資本》〉，《史林》2000 年第 4 期，頁 56。

作者顯然忽略了不同地區政治、社會、文化因素對經濟造成的不同作用。

再就全書的理論架構而言，如果說作者所極力抨擊的華勒斯坦等人的世界體系，是以資本主義為特質，那麼，作者所提出的 1400-1800 年的世界體系，應該就是以貿易主義為主要內涵。作者認為透過全球多邊貿易關係，世界經濟發生分工的現象。然而，是否有商業的往來聯繫，即表示世界市場已經整合在一起？如果能進一步討論各地區對作者所說的世界貿易是否倚賴、倚賴多深，應該更能證明此整合的世界市場是否存在。

由此觀點出發，作者對資本主義的解釋也不夠明確，他認為中國在該段時間貿易大量順差，有了資本累積的情況；同樣的，歐洲在 1750 後對白銀的掌握，也使其具有資本的優勢。但是擁有資本是否表示即是在進行資本主義式的經濟？Samir Amin 指出這樣純以經濟的思考，太過簡單。因為所謂的資本主義是一種包括生產、政治、社會生活、意識型態在內的社會模式，它使所有的部分均深深的整合在這個系統中，1400-1800 年之間的世界各地區之間是否有如此深刻的結合，他表示相當懷疑。Amin 認為作者以濱下武志的東亞朝貢體系來論說，與資本主義的出發點不同，因為前者主要是由政治來定義，而後者則著重經濟的宰制關係，兩者極為不同。¹⁰作者以此認為現代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是 1400-1800 年體系延伸的觀點，就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所以，正如 Giovanni Arrighi 所說，由於作者「過於相信全球視野的力量能帶給我們歷史的真實」，反而使他忽視了不同地區與不同時間點的差異性。¹¹這正是本書理論架構的特色所在，卻也是它引人非議的最大致命傷。

作者想探討的主題非常龐大，原即非一本書所能涵蓋，難免掛一漏萬，但就他提出的中心主旨一反歐洲中心論而言，卻有刺激讀者思考的正面作用，而他的論題其實也反映了西方學術界不斷檢討與反省自身研究的趨勢，在做了觀察與提問之後，下一步的工作即是更為細緻的實證研究。

¹⁰ Samir Amin, "History Conceived as an Eternal," *Review*, Vol.12: 3(1999), pp. 299-308.

¹¹ Giovanni Arrighi, "The World According to Andre Gunder Frank," *Review*, Vol.12:3(1999), pp. 339-342.